

论及徐迟,诗人、报告文学作家、翻译家是加诸于他的诸多标签或者头衔,却很少有人会称其为小说家徐迟。他的小说创作长期被其他文学类型的成就所遮蔽,尤其是他20世纪三四十代的小说创作具有相当的特质,与同时期类似的小说创作相比,具有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新质。这一时段徐迟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其小说创作的重心落脚于情感世界的直抒胸臆,对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着墨颇多,与当时盛极一时的新感觉派颇有渊源,却并不从属于其中,具有个人的独特气质;上世纪30年代后半期直至40年代的小说创作,徐迟也积极参与到当时的时代命题之中,战争成为其时小说创作的主要题中之义,但徐迟在小说中对战争的刻画,打破了战时文学大多遵循的“战争价值”,返回到人的生存价值和文学的美学价值之上,丰富了斯时小说创作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在晚年创作的自传《江南小镇》中,徐迟自己曾秉笔直言:“1934年的上半年……我不时地到上海去,拜访施蛰存、杜衡、叶灵凤和当时最出风头的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和刘呐鸥。我对新感觉派也很感兴趣,甚至有点儿着迷……不过我没有写出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新感觉派作品。到了我的晚年时期,我才写出了一些有点儿影响的作品,其中我是用了一些新感觉派手法的。”(徐迟:《江南小镇》,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0页。)这样的直言不讳,让读者和研究者或许能更全面地看待徐迟之人、徐迟之文,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至少上世纪30年代初期的徐迟,是一个对现代性乃至新感觉派的主张都有所涉猎,甚至付诸实践的文学青年。他当时的诗作自不必赘言,小说创作也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新感觉”色彩。令人欣喜的是,徐迟这一阶段小说创作的情感倾向,或者意蕴基调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能充分感受到都市生活中“爱”之悸动与甜蜜,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一部分作品存在着相当突出的颓废、悲观乃至绝望、色情的倾向”(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尽管徐迟自己毫不讳言对于“新感觉”的沉醉,也在创作实践上极力学习,但他此时的小说创作并不过分沉溺于“颓废”、“绝望”、“色情”之中,甚至有清新之感,肆意张扬着青春、情感的美妙与愉悦。这样的创作倾向充分体现在小说《开演以前》《升C短调之夜》《月光下火柴下的恋歌》《海的

摩登与战争的交响

——略论徐迟20世纪三四十代的小说创作 □朱旭

过失》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

《开演以前》主要描写了一对恋人薇和洛,但重点不在于刻画人物形象,也不在于情节的铺陈,而着重强调了在等待薇到来的日子里,洛的心理状态及情感活动,整篇小说漫溢着“期待”。小说开篇即说“开始忙,是接了信的四月三号”,这一天洛接到薇的来信,告诉他六号上午七时将会到达北平。从这一天起,洛便开始了“忙碌”,开始了每时每刻的倒计时。小说中薇并未真正出来,甚至是一个符号式的人物,只为了引起洛的心绪与情感的波澜。接信后,洛带着忐忑的心着手回信,一连写了好几封都不甚满意,连一个开头的写法都换了又换了又改,足见这男青年的激动与重视程度。这封回信通篇洋溢着“高兴”,洛甚至直接将“高兴”一词多次连用,表达出一种语无伦次的兴奋。终于寄出回信后,在等待的日子里,尽管薇不在场,但洛的一切行动和心理状态都围绕着薇展开,目之所及的一切景物都能使他联想到薇的一颦一笑。看到美好的景色,会想到薇看见时的情态;走进自己的屋子时,会想到薇也许受不了这气味,便赶紧开窗通风、打扫卫生、铺设桌布、插上鲜花等,甚至专门借来几本书装点房间;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思考见到薇时的穿着,便急忙擦皮鞋,然后构思、安排薇之后的游玩行程……不仅如此,洛在夜晚的梦中会梦见薇,在白日的幻想中会畅想两人的约会,“做了上万个薇的梦,一切上千上万的事,是为了要等待,所谓第三个明天,这第三个明天,感谢上苍!终于在破晓中来了。破晓不久,一辆黄色的汽车,蜿蜒自大马路上飞过来。载在里面的有一个笑着的少女,不久之间,在洛的双手迎接之下,这少女自汽车上跳下来,彼此却全无言地笑了一笑。”(徐迟:《开演之前》,《徐迟文集》(卷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小说在写到薇的到来便戛然而止,青年男女之间微妙的暧昧,通过对一方行为、心理情态的刻画,就这样被徐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洛的等待存在无限希冀,不是无谓地“等待戈多”,洛的一系列举动和心理活动,充分呈现出一个怀春男青年的可爱,对于二人情感的刻画徐迟也处理得十分纯净、清新,彰显出青春的美好和人生充满希望。

《海的过失》这篇小说,更是体现出“新感觉”的特质。描写了乘同一艘船的青年男女,在船上的舞会上相识、相熟,当然还有年轻的激情的碰撞。《升C短调之夜》全文用音乐连缀,《月光下的火柴下的恋歌》这篇小说又用音乐架构全文,等等,都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和浓郁的青春情怀。

在徐迟这一时期的小说中漫溢着美好的诗情画意,小说的基调并不颓废或者伤感,充满了青春孟浪的荷尔蒙,丝毫不吝惜情感的直接表达和外放。更难能可贵的是,徐迟在这些小说的创作中对于都市男女情感生活的描写是节制的,并非停留在感官层面。“与日本的新感觉派相比,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由于‘感觉’对‘都市’的过分沉溺,以致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非中国’和‘非现实’的文化身份上的暧昧,它匮乏那种对生命价值的终极追问和对生命存在进行深刻体验的灵性,其存在主义要素不免带有几分浮掠性特征”。徐迟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正好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感觉派”小说在此方面的突破,尽管描写摩登年代都市摩登男女摩登的感情生活,但不沉湎于纵情色和都市的物质生活的纸醉金迷,而是展现了生命的有所期待,正视了作为个人的正当的情感需要,充满希望地展现生活的美好与诗情画意,体现出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灵性。

二

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半期直至40年代,战争的号角吹响,作为斯时的热血青年,徐迟对于战争的体验也充分呈现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因此,此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徐迟也将战争作为题中之义。“战争文学,由于生成环境的不同,其审美追求及其价值向度亦有差异。战时的战争文学,是适应着战时的国家、民族、政党和信仰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时空内涵的艺术,从战争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价值意义来说,它是现实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战时的战争文学是建立于战争价值基础之上的。在战争作为生存现实的前提下,作家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遵守战时道德,走向战争化,将文学融入战争机制。”(房福贤:《中国抗日战争小说的历史回顾》,《文史哲》,

1999年第5期。)因为非常态的生活法则,人类的生活机制被“战争机制”所代替,战时文学的表现或者说价值立场,很大程度上也呈现出“战争价值”。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总体上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数量和质量的骤然下降,使三十年代形成的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一度中断。二是小说与报告文学的界限日益模糊,小说几乎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文体价值”(谢昭新、李丽:《论四十年代小说理论的时代性演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4期)。这是时代和历史的裹挟,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时代精神的选择和民族精神张扬的需要。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受到的伤害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多元的丰富性。

不过,也有一些作家打破了上述窠臼,企图从不同层面有所突破,张爱玲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成为一种“独特声调”(钱理群:《昨天的小说与小说观念》,《上海文学》,1994年第6期)。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小说创作观念,她说:“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肆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页。)除了张爱玲以外,挑战主流小说观念,丰富了斯时小说创作的还有芦焚、萧乾、汪曾祺、废名、冯至等人,他们从小说理论建设到小说创作实践都有独特的见地。而徐迟此时在小说中对战争的描写,也不同于主流观念,而用生存机制来观照人物的生活,以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为准则进行创作,但他此时的小说创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37年,徐迟创作了小说《三大都会的毁灭》,描写了青岛、北平、上海这三大都会在战争中的毁灭,其中更是采用独特的视角和反讽手法,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思考。对于青岛空袭的呈现,徐迟采用了复合型视角——一名日本海军军官和一群中国空军。这名日本海军军官对于军事上的不甚顺利有些消沉,只有在想到“光荣地屠杀了上千万中国民众这个数字,给他一些安慰”。

此时司令室的门被舰上的无线电报员粗鲁地推开了,“无线电报员送上的十万火急的消息,是中国空军轰炸青岛,第五舰队发来的求援电文。”(徐迟:《三大都会的毁灭》,《徐迟文集》(卷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页。)

通过日本海军军官的视角,读者了解到青岛被轰炸,且是被中国空军轰炸的这一事实,便会心存疑虑,为何中国军队会轰炸自己的国土,作者在此留下未解之谜便将话锋一转,将叙事时间转换到日军收到电报的5个小时之前,将叙事的视角也进行了转换,投射到一群中国国民党空军的身上。在一座华灯闪耀的厅堂里,十几个魁梧的青年谈论着战争,笑着英俊青年的恋爱,这样的生活场景与残酷的战争似乎不搭界。但正是从他们似乎轻松的聊天中,对恋情的调侃中,读者知道了“焦土抗战”的策略,而青岛的毁灭原来是中國军队对日军的报复行为,因为日本在青岛有众多资产和工厂。解了青岛之毁灭的悬疑,作者又将笔触伸向北平,这座中国人骄傲的文化古城的毁灭。对于北平毁灭的描写,作者采用的是中国军中一个文官的视角。这个文官在思考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的话:“宁愿化成焦土,我们不能轻易把国土往人家送”。他一直在挣扎,内心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认为为了人类和文化,应该去阻止他们轰炸北平,另一个却说为了民族、国家、正义,为了自由和战略,应该趁早毁了北平。最终他信任的军事领袖和同事们替他做了选择——轰炸了北平。9时开始轰炸北平,日军11点才接到消息,于是作者又把视角切换到日本海军司令,前一夜才轰炸了青岛,此时又接到北平被轰炸的消息,“这损伤了他对于支那人的一贯轻视的心。同样这也损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素来主张“放火”,感到“放火”的机会来了,随便抓几个借口就行。于是,所有的战舰瞄准了上海,一声令下,“大上海浴着火,浴着血”。青岛、北平、上海这三大都会就将被毁灭了。作者采用复合型视角的自由切换,尤其是日本海军军官这一独特视角的采用,多方位展现了三大都会被毁灭的前因后果,虽并未直接呈现战争场面和战争进程,但这些大都会毁灭的原因和过程却极具讽刺意味。青岛和北平

的被毁,是源自当时“中央政府”的“焦土抗战”策略,但这一自杀式的战略甚至连自己的军官都心生疑惑,上海的被毁灭缘自报复,随便抓几个借口就可毁灭一座大都会,致使生灵涂炭,无数人失去家园,这战争着实讽刺。战时,人的生存机制就该被战争机制所取代吗?这是来自作者掷地有声的诘问。

除了《三大都会的毁灭》的毁灭,此一阶段徐迟的其他小说也都从不同角度凸显出作者对于战争的诘问。《愿他的灵魂安息》这篇小说中,徐迟通过一个掉队士兵引领读者进入他创造的故事世界,这个士兵对于尸体和死亡的麻木令“我”震惊,也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战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戕害,对于人应有的生存机制的践踏。《宝塔》中,作者以河边的宝塔作为定点,也作为瞭望台,观照周边发生的战事和战争中的人。《一个镇的轮廓》中,又通过一个小镇在战争中的命运,凸显了日军对中国进行的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及殖民政策。《年轻的教授》则将触角深入到我们自己人民的内部,了解恐龙的年轻教授,却不认识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因为他们觉得“抗战不能不抗,可是麻将不能不打”。《一塌糊涂》更是涉及到了中国抗战期间,国外有志之士对于中国的医疗援助。来自西班牙的马赛尔医生,医疗援助抗战中的中国,却累于繁琐的文件之中。在《无我》中,作者思考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之战时准则的合法性。“不过,好日子哪天有?”这篇小说,着重描写一对年轻夫妻的日常,通过他们下班后、睡前等的闲聊,妻子不断追问,“不过,好日子哪天有?”呈现出抗战结束后对国内局势的态度。内战的一触即发,人心的惶恐等,都通过再平凡不过的小夫妻的日常絮语侧面呈现。由此可见,徐迟此时的小说创作,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观照视角,或者体察层面,几乎将触角深入到除了正面战争以外的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且选取的视角都不尽相同,反讽的手法更是运用得十分醇熟。

在徐迟对于战争进行叙写的小说中,并没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也没充斥激昂的民族情感和对侵略者的满腔愤怒,而是沉潜到更确切说是还原到人本身的生存机制上来,展现战争时代多样的社会人生和时代情态。这样的处理方式避免了文学乃至人生被战争裹挟,被战争遮蔽。当然这并不是对战时主流文学的否定,而是一种丰富,一种多元创作价值的共生和共同繁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徐迟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关注,更深层的探究,更高程度的重视。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伯父教我「定向努力」

我的祖父徐一冰有五个子女,前三个是女儿,第四个是儿子,为“迟”(商寿),第五个又是儿子,为“止”(舜寿)。我是止的女儿,迟的侄女。从小,依母家(成都大家族)习惯,称伯父为大爸。其实,父亲仅一位兄长,我们没有二爸、三爸。成年后通信,提笔“大爸”,他回“用大伯”。是,改口不易,落笔用大伯。

50年代初,大姑、三姑、大伯、父亲聚到北京,四家分住东城、西城。聚会时,大人们叙谈甚欢,孩子们嬉戏疯玩,留下欢快童年的三五彩页。1958年,父亲为飞机设计,举家迁往沈阳。1961年,大伯为长江三峡,阖家去了武汉。父辈追着事业走,我们跟着父母走,到哪儿都是家。

我们在沈阳生活了7年,对大伯的印象更多来自书架,过一段时间,就会多出一本书脊上印着徐迟著的新作,《美丽·神奇·丰富》《庆功宴》《诗与生活》,还有那些毛边的《诗刊》。我不懂:“这书怎么没裁齐,还没做好啊?”大人回答“就是这样。哦,大伯做事是不同一般的。

1965年,我们再随父亲迁往陕西。1966年,一切都不一样了。1968年,爸陨亡,家破碎。姑姑家、大伯家都落难。北京大姑家被迁到一间只能以天窗采光的陋室,成了家族的联络点,天各一方的亲人们以各种方式互通消息与关爱。

1973年,我在工厂做工,侥幸有机会去武汉公干。先与近20年未见面的大伯联系,那时他的关系还在干校,人恰在武汉,借住在伯母朋友江阿姨家。会后,我拎着行李找到江家,一眼望到门口的大伯,恍若见到远去的爸,顿时间泪如雨下,积压多年的苦水一泻而出。

江家三天,谈了三天。他细问我们这些年经历,爸是怎么去的,妈与我们姐弟是怎么过来的,周边的人与发生的事……更多是听我讲,默默地听,反复地问,不放过细枝末节。他不仅要知道,还要记住。

那些年,我们几度被搬家,从院里到院外到村边,居住空间越搬越小,最后栖身于紧挨老乡厕所的一间土坯房。我从农村回去探家,妈感慨不已:……这一生,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学识,这不是别人给予的,也不是别人能夺走的。并郑重叮嘱:我们家世代读书,你即使不能上大学也要读书。说到这些,大伯问,你在看什么书。我边答边打开手提袋,拿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说,回去把你看过的书开个单子寄给我。

第三天,他说,出去走走吧。出门时,他穿了一身长款皮夹克,我一下想起苏联电影里的捷尔任斯基和列宁的卫士,脱口赞:看着像契卡。他笑笑。近午时,我们在一家馄饨店前排队,一位女士

走近悄声问:“你是徐迟吗?”他又笑笑。那一年,长大了的我,看到的是一个默而少语或笑而不语的伯父。

自此,陕西-湖北之间书信往返。每每看到那自由体操般的字体,暗道,该交作业了。先是我寄去已读书单,他回复:开卷有益不够,要定向努力。要一门一门地学,每一门都要深入进去。我遵嘱,排出顺序,先语文,再文学,再哲学……又过一段时间,我又报告,在读什么书,有什么收获。他又回复:要从源头学,文学史、诗歌史、哲学史。我又遵嘱,扩充书目,《中国文学史》《古诗源》《文选》……再过一段时间,我再报告,读什么书,有什么感悟。他再回复:不能只学中国的,还要学世界的。我再遵嘱,扩大选书,《欧洲哲学史》《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纲》《法国文学史》……

3年之后,起念学英文。毕业于华西大学外文系的妈指出,你现在学外语已经过了最佳年龄,只能以下苦功弥补记忆力。不要贪多,即使学外语专业的也很少听说读写俱佳者。你要明确为什么学,主攻一样。我毅然:“为读原著。”

就这样,大伯指引着我,读书、读书、再读书,充实着工余时间和苦闷的心绪。夜长漫漫,不时生出“就这么一直读下去?”的不耐与困惑。而一句“厚积薄发”,让迷茫的心在书中得安。那几年,困顿中的我,感受的是一个循循善诱、代代教女的伯父。

1978年,春来了。1月,《人民文学》发表大伯的《哥德巴赫猜想》,紧接着是《在湍流的涡旋中》《生命之树常绿》《徐迟报告文学集》。7月,有关方面为大伯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整整10年,终有说法。三姑、大伯及长姐徐律来到陕西阎良,他们是来告慰大伯的在天之灵,也是来给孤困一隅的亲人以支持和温暖。秋季,恰值我在京期间,新华社邀请大伯,他带上我,对我介绍“这是侄姑娘”。李普陪着他步入会场,上台,演讲,交流,场面热烈,应答睿智而风趣。那时,我看到了一个博学通透、神采飞扬的伯父。此行让我这个跟班萌生了一丝记者梦,曾试探:“我能不能去陝西日报?”他不赞成:“新闻是要跟形势的……不急,再等等。”

1979年,春盈然。我和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永别伤心地。这个改变的提议有大伯,推动的是姑姑和姑父。中组部给了两个进京户口,自己联系工作单位。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报到那天,大伯与冯至不期而至地去世界史所串了个门儿。我则机缘巧合进了国家旅游局。

在国家机关,以我一年高中、三年务农、八年

做工的履历,自是从最后一名干起,经历了杂务(发工资、分苹果)、剪报、联络记者,都没找到感觉,心有不甘,唯加紧学英文、旅游、经济。3年后,被调整到新成立的信息处,从事旅游市场调研,较快上路,逐步得到认可。某日,陡然醒悟,“定向努力”成功了!家师指点,循序读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语出《颜氏家训》,滋育着我的思辨能力与码字功夫。十年磨一剑,终得发力,毕生受益。

回首当年,我茫然不知路在何方,也没有明确的“五年计划”。只是弟子一步一步地报告读书进程,先生一次一次地指出所学不够,再多,再宽,再大,润物细无声地指导我在自学的路上“定向努力”。

几十年过去了,书柜里分类排列的“授业父子”们已渐显沧桑,其中有大伯送我的臧克家赠他的《古诗源》(清沈德潜选),扉页上是:“赠大伯克(签名下钤私章)”,内页有我读书的标记,还有女儿学习的标注。好书代代传。

回京后,与大伯通信少了,见面多了,家族聚聊,都喜欢听他侃侃而谈,散发着热量般地感染着周边的人。他爱用“好得不得了”来赞叹,我莞尔“这可是(英文形容词的)最高级啊!”有时他会走神,喃喃自语,我偷乐“构思呢?造句呢?”

80年代中期,我出差出国的频率渐增。1988年,在武汉水果湖大伯家里欢谈,他笑:“要去布达佩斯啊,回来讲讲。”此后,每次见面:“又去哪儿了?讲讲”。开始不经意,几次讲不出或讲不好他之所问,才悟出“讲讲”是作业,一如当年的书单啊。受“讲讲”的敦促,备了套《世界概况》,出行前先预习;行路中边看边想,多问几个为什么;旅行笔记的内容逐步拓宽;归途复习梳理。从“讲讲”体会到大伯是在用多棱镜观察社会,关注世界。

某年,他提出,出国时帮他找书,每次一本。不要贵,要新。不要文学的,要最前沿的思潮,最新的观点,科学的、技术的不论。不要译文,要英文原版。于是,每到一地,再忙也要钻书店,书目、作者、简介、版本、日期……不亦乐乎地为他选为自己选。已经不记得选过哪些书,只记得他看一眼就叫好的那本书是向爱因斯坦叫板的。从“找书”体会到大伯的思绪越飘越远,在不停地思考中探究着人类的命运。

父辈的世纪过去了。如今,他们五姐弟都回到了故乡,落葬湖南南淳,团聚在父母身边。我每年都回大伯手下那个“水晶宫”的江南小镇,感受桑梓情深,感恩恩师的滋养与亲情的温厚。

(作者系徐迟家属)

丛刊2017年第12期目录(总第221期)

文学史研究

- 战争、革命、人之观念的交织与流变——《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序论 李今
西部中国的“现代形象”——1930年代范长江、斯诺与陈学昭的西行写作 罗雅琳

诗歌研究

- 梦与蛇:何其芳、冯至与“重生的抒情” 【美】王德威
“尤利西斯”的归来:张错的离散书写 【新加坡】张松建
吴兴华作为现代诗人的生成 【英】贺麦晓 著、李春 译

鲁迅研究

- “化俗”之超克——鲁迅《起死》的叙事渊源与主旨辨析 祝宇红

学术评论

- 王富仁学术思想评述 刘勇、李春雨
中韩近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崔一